

# 自序

偉大的中國工農紅軍長征，意義非凡，影響深遠。幾十年來，關於紅軍長征的著作可謂浩如煙海。當我還在童年的時候，就從小學課本裡背誦紅軍英勇長征的故事和毛澤東關於長征的論述，在感受著長征鉅大魅力的同時，也接受了關於什麼是紅軍長征的「定式教育」。

成年後，接觸到許多紅軍長征的參加者，發現他們眼裡、心裡都有自己的長征。出乎意料的是，他們並不完全認同那個關於長征問題的「界定」。

這些長征的親歷者中，也不乏對長征做過長期研究和深入思考者，他們有的在指出「傳統歷史」關於長征的一些錯誤描述後，感嘆道：我們講了大半個世紀的「唯物主義」、「實事求是」，可是，遇到要害問題，有幾個人敢於堅持？有多少實事、真事變成了虛事甚至假事了啊！

這促使我萌發了探究長征的志趣。剛好，我遇到了一個極為難得的好時機，中共中央十一屆三中全會後，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得以恢復，撥亂反正已經開始，那些歷史老人們過去長期憋在心裡的話，可以暢所欲言，他們有的剛剛離開工作崗位，身體健康，精力尚好，為我廣泛深入地訪問求證提供了良好的條件；同時，大量塵封的歷史文電檔案，也有一定程度的解密，由於工作的關係，也給了我仔細查找和翻閱的便利；在此基礎上，又親身前往紅軍長征沿線，感受山川地理，認知遺址遺跡，辯證逸聞故事，開始了對紅軍長征問題的探索。一些老紅軍、老將軍和他們的親屬都給予了我熱情的鼓勵和支持。

其間，原紅二方面軍苗族戰士、軍旅作家陳靖老前輩告訴我，許多的紅軍老戰士「有這樣一個感想：目前為止，還沒有一部實事求是的長征史書，幾乎全是出於概念之需」。他還對我說，他有一個心願，在有生之年，寫出一本真正屬於紅軍長征的書來。

陳老有這個實力。他是長征的親歷者，建國後參加了紅二方面軍戰史編寫工作，對其他長征部隊也相當熟悉，20世紀80年代又重走了五支部隊十萬餘里的長征路，進行了專門的考察，也積累了大量資料，長期以來對紅軍長征有深刻的思考和研究。陳老還說，他經過慎重考慮，希望我和他合作完成這本書。我當即欣然表示贊同。可是，正當我們為此作前期準備期間，陳老先是患病住進了醫院，不久與世長辭。陳老走了，帶著對未竟事業的遺憾走了。

在此情況下，我更覺得責無旁貸，也希望以我的「長征」來作為對老人家精神的紀念。

在對紅軍長征歷史的長期艱苦探索中，的確有了許多的新發現，這些新發現，有力地證明了「傳統歷史」存在著一些片面表現歷史，甚至於歪曲、顛倒歷史的情形。

比如，關於「長征的概念，人們往往拿出『二萬五千里』、『12個月』、『11個省』」的說法，這個說法，正是我們必須摒棄和超越的，因為它遠不是紅軍長征的全部，它僅僅說明紅一方面軍的長征。事實上，紅軍長征的參加者除了紅一方面軍，還有其他幾支部隊，有紅二方面軍（含之前獨立行動的紅六軍團）、紅四方面軍、紅二十五軍，此外，另有作為抗日先遣隊的紅七軍團。所以，應該說，共有六支獨立的紅軍部隊參加了長征。其長度比「二萬五千里」長得多，範圍也比「11個省」大得多，時間可就更長了。長征並非某支部隊的獨立行動，它是戰略棋盤上各部隊相互配合的整體運行。從一開始，紅軍各部隊就相互策應。長征的勝利，正是各部隊和沿途數以千萬的人民群眾相互支援幫助的結果。特別需要指出的是，為了策應掩護紅軍主力，為了紅軍長征的勝利，先有紅七

軍團（不久與紅十軍合編為紅十軍團），後有紅西路軍這兩支英雄的紅軍部隊，付出了幾乎全軍覆沒的代價。所以，歷史要求我們必須從整體上看長征。

再比如，關於一方面軍長征的起因，即中央蘇區喪失的原因，「傳統歷史」歸結為王明「左」傾路線。直到今天，人們還認為「王明推行的左傾路線，使蘇區紅軍損失 90%，根據地損失 100%」，是「歷史的結論」。<sup>①</sup> 這一說法難以成立。誠然，王明為代表的「左」傾的確是重要原因之一，但絕不是唯一原因，也不是根本原因。在正視王明「左」傾錯誤危害的同時，更應該注重當時國民黨蔣介石兵力的強大以及其「圍剿」新戰略推行的作用，也不可忽視根據地其他領導人「左」傾的危害。這種「左」傾雖然與王明的「左」傾有所不同，但危害同樣不可低估，甚至在程度上更為嚴重。毛澤東在開創中央蘇區的鬥爭中作出了無與倫比的貢獻，然而，他的一些極左思維和行動又嚴重地傷害和動搖了根據地和紅軍的根基。這些又是無法否認的。

又比如，如何反映長征中的團結與分歧、會師與分裂的重大事件呢？在「傳統歷史」中，關於長征中的一、四方面軍會師和分裂，作了很多脫離實際的描述和渲染，以及並不實事求是的結論。事實上，為了迎接和援助紅一方面軍，紅四方面軍顧全大局，作出了積極努力和重大犧牲，甚至被迫放棄了川陝蘇區。而「傳統歷史」將兩軍勝利會師後的曲折，最後釀成分裂結局，單純歸結為張國燾的野心。其實，它有著複雜的原因和背景，並非獨因張國燾的野心所致，其他人也有難以迴避的責任。這一沉痛教訓，尤其值得剖析探究，深思銘記。

此外，由於某種需要，「傳統歷史」在反映長征時充滿著遠離歷史事實的神格化的東西。本來，歷史地看，長征時期的中國共產黨還處於青少年時期，黨和紅軍領導人也差不多處於逐步成熟狀態。取得成功和勝利，值得慶倖和歌頌，發生某些

<sup>①</sup> 金一南著：《苦難輝煌》，華藝出版社 2009 年。

失誤，也尚可理解。可是，「傳統歷史」卻罔顧基本事實，將某個領導人極盡神化之能事。比如，四渡赤水，儘管當時飽受非議，卻被描述成「用兵如神」；後來實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策略後出現的有利於黨和紅軍的「大轉折」卻被嫁接到了遵義會議頭上，等等。正如陳靖所言：「從不少高權威大學者一直到胡喬木那裡，始終維護一個根本：長征是由於某一個人的作用而取得勝利的。」<sup>②</sup> 這種對某一領導人的神化，只會使長征的面目走樣。

然而，歷史就是歷史，它的本來面目難以人為改變。

中國工農紅軍長征，是20世紀最偉大的事件之一。它的發生，源於一個偉大的土地革命和蘇維埃運動的繼續；它的完結，則是一個偉大的民族解放運動的興起，它是一曲英勇頑強、艱苦卓絕的時代與民族的頌歌，同時也是人類的一筆豐厚的精神財富。對於它，知情權、繼承權和開創權，應當屬於人民，也終將屬於人民，其中包括那些成千上萬的參加者和他們的子子孫孫。那種闡述歷史如同獨攬新聞發佈權的狀況，終究是無法繼續下去的，因為人民必然要去探究和求索。

本書希望做一嘗試。

夏宇立

2009年春於北京

---

② 陳靖致筆者書信。